



世纪文库

# 责任与判断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责任与判断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陈联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责任与判断/(美)阿伦特(Arendt, H.)著;陈联营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ISBN 978-7-208-09152-8

I. 责… II. ①阿… ②陈…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西  
方国家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2296号

---

责任编辑 毛晓秋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责任与判断**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陈联营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 页 4  
字 数 200,000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52-8/D·1697  
定 价 39.00元

##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榕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 责任与判断

# 编者导言

杰罗姆·科恩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如果说世纪初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一系列危机还能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如下简单的事实：对于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来说，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汉娜·阿伦特（1906—1975）一直认为，哲学对政治，或者说理论对实践，或者更简明地说思考对行动，形成的关系是很成问题的，她用上述这些话概括了她对此进行的毕生思考。当时她正在给大批听众作报告，这些听众来自美国各地，聚集在曼哈顿的“河畔教堂”参加“现代社会的危机特征”<sup>[1]</sup>研讨会。时值1966年，一场特别的政治危机，即越南战争的扩大，正悬在这些公民的心头，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表达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关注，商议他们个人和群体能为改变这项政策做些什么。自己的国家正在毁灭一个古老的文化和一个并没有威胁到他们自身的民族，他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不义的，因而求助于阿伦特和其他发言者，希望他们关于过去危机

---

[1] 阿伦特的简短发言后来发表于《基督教与危机：基督教观点杂志》（*Christianity and Crisis: a Christian Journal of Opinion*），vol. 26, no. 9 (May 30, 1966)，pp. 112 - 114。



的经验能有助于理解眼下的危机。

至少在阿伦特那里，他们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尽管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和其他危机的确曾是阿伦特多年思考的焦点，但她无法给他们提供估量曾经犯下的过错的任何“一般性标准”，更不用说提供应用于正在发生的过错的“一般规则”了。关于确证他们已经固执的信念，把他们的观点解释得更具说服力，使他们的反战努力更具成效，阿伦特没有任何表示。她不相信根据过去那些有效或无效的教训反推出来的类比就能改变目前的困境。她明白，政治行动的自发性受制于其特殊环境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就使上述类比失去意义。例如，1938 年“绥靖政策”在慕尼黑的失败并不必定表明商谈在 1966 年就毫无意义。而且，尽管阿伦特相信全世界必须警惕造成极权主义的种种因素，例如种族主义和全球扩张，但她反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类比做法，反对把“极权主义”这个称号应用于任何美国可能反对的政权。

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的名言，“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而是说，依靠“所谓的历史教训”来指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只不过是略胜于巫卜之术罢了。换句话说，她在本书末篇“报应降临”中关于过去清楚地表达的观点，要比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这句经常被重复的话更复杂且更不那么确信：“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相反，阿伦特相信，无论如何，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它实际上所是的样子：“在任一时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界。”她的这种信念不是一种历史“教训”，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过去的行动——在现在如何被体验到。对于这个问题，在“报应降临”一文中，她没有用一种理论去回答，而是在她对 1975 年的美利坚共和国状况的悲欣交集的判断中，为她所说的过去的在场提供了一个例证。她说，尽管美国“自由制度”在“两百年前的创始”是“荣耀的”，但对它的背叛现在“时刻萦绕”

着我们。背叛的事实已经发生，而我们能够坚持忠诚于起源的惟一方式，不是谴责“替罪羊”，也不是逃避到“想像、理论或者单纯的愚蠢”之中，而是尽力使这些事实“受欢迎”。正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现在应该对这些事实负起责任。

她给出的惟一建议，如果那还可以称为建议的话，包含在她对“具体问题”所作的“具体分析”中，下面的轶事可以说明一二。<sup>[2]</sup> 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们曾请教她，在抵制越战时是否应该与工会合作，令他们吃惊的是，阿伦特毫不犹豫且通情达理地回答：“当然应该啦，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使用他们的油墨印刷机。”同一时期的另一件逸闻则来自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一个跟提建议完全无关的视角。在反战示威的学生占领新学院的教室后，全体教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是否应求助警察来恢复秩序。大家提出了各种反对和支持的意见，随着会议的沉闷进行，这些意见逐渐趋于对事件作出一种肯定的决定。阿伦特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同事中一位她年轻时就熟悉的朋友不情愿地同意，必须把事件通知“权威机构”，这时，阿伦特突然对他说道：“天哪，他们可是些学生，不是罪犯。”这次会议再没有人提到警察，而且这句话实际上结束了全部讨论。阿伦特出于自己的经验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使她的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讨论的是他们与其学生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学生与法律之间的问题。<sup>[3]</sup> 她的反应是对特殊情况就其特殊性所作的判断，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在许多讨论中被模糊了。

对于20世纪的这些政治危机——首先是1914年全面战争的爆发；接着是俄国和德国极权政治的兴起以及它们对整个阶级和种族的灭绝；接着是原子弹的发明和二战期间用于摧毁两座日本城市；接着

---

[2] 非常感谢伊丽莎白·杨-布吕尔 (Elisabeth Yong-Bruehl) 回忆了这些插曲。

[3] 阿伦特经常兴致勃勃地讲起1933年她因为替犹太复国运动工作而在柏林被捕的故事。审讯她的警官一眼看出她不是一名罪犯，不是应该被关进监狱的那种人，就安排把她释放了。她马上逃离了德国。

是冷战和后极权主义世界用核弹摧毁自身的空前能力；接着是朝鲜，接着是越南，等等，对于这些“如历史的尼亚加拉瀑布般涌泻而来”的事件，没有人比阿伦特更明白，可以从一种道德崩溃的视角理解它们。显然，这样的崩溃曾经发生过。但就阿伦特所见而言，其富有争议和挑战性且难以理解的核心是，这种道德崩溃的原因不在于那些不能辨别道德“真理”的人的无知或邪恶，而在于道德“真理”根本不足以作为判断人类有能力做的事情的标准。阿伦特敢于作出的惟一一个一般结论讽刺性地指向那种普遍状况，即西方思想的漫长传统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事物的彻底变更。道德思想的传统已被颠覆，不是被哲学的理念颠覆了，而是被 20 世纪的政治事实颠覆了，而且再也无法弥合。

阿伦特既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非道德主义者，而是一位追随自己的思考活动的思想家。然而，读者们如果要追随她，就得承担一个任务——这与其说是对智力或知识的要求，毋宁说是对思考能力的要求。她提出的不是理论性的答案而是激励人独立思考的丰富性。她在托克维尔的下述洞见里发现了重大意义：在危机时代或独特的转折时刻，“过去不再把它的光亮投向未来，人类的心灵在昏暗之中徘徊”。她发现，在这种关头（而对她说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心灵的昏暗最清楚地指示着那种需要，即重新思考人类责任的意义和人类判断的力量。

1966 年，阿伦特正声名卓著，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她是恶名远扬。三年前，即 1963 年，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出版，掀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使她与许多亲密朋友的友谊破裂了，并且使她与全世界的几乎所有犹太社团关系疏远。这令阿伦特很伤心，她是一名德裔犹太人，她把这一出身的事实看作她生命中的“天赐之物”，一份在她思想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特殊经历的礼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有人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攻击时，阿伦特发现他就必须作为一名犹太人来回击。对于那种声称犹太人是低等人，是寄生

虫，并且像寄生虫一样应该被毒气毒死的指控，她应该拒斥它而非反驳它，但如果用人性的名义来拒斥，主张人权，那也是不合适的愚蠢做法。惟一恰当的反应是：我是一名犹太人，我作为一名犹太人捍卫我自己，由此表明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阿伦特作为一名犹太人承担的责任表露在她的号召上，号召建立一支与犹太人的敌人和毁灭者进行战斗的犹太军队。<sup>[4]</sup>

那么，人们对《艾希曼》这本书有些什么反应？犹太人的愤怒集中在阿伦特对下述事实的记述（只用了不到十页）上：当时一些欧洲犹太社团领袖在挑选他们的教友，那些不太“显要的”犹太人，把他们先行送往毒气室时，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了“合作”。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审判中就被提出来了，而且在审判前后都得到了证实。但是，对阿伦特的下述指控，说她的恶的平庸性的概念使艾希曼的所做所为平常化了，甚至说她是正在为他开脱罪责，使他的罪行如此之轻，乃至他还没有他的受害者们“丑恶”，这完全是荒谬的。无论犹太领袖们提供了怎样的“合作”，但发动和执行对犹太人的生存问题的“最后解决”，即系统化、工业化的屠杀的，是得到像艾希曼这样的人支持的希特勒及其随从。犹太领袖之所为当然也是道德普遍崩溃的一个明显迹象，但是，犹太人对于种族屠杀政策本身并无责任，这对阿伦特就像对任何人一样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阿伦特的那些犹太读者不能分辨具体的责任何在，这向她表明了苏格拉底下述命题的彻底颠倒：“遭受冤屈要比冤枉别人好。”因为现在看来，那些犹太领袖在纳粹统治之下做了不义之事，选择那些不怎么“出名”的人先予处死，而不是他们自己去牺牲，这似乎不仅可以理解、可以接受，而且是“负责任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当公众意见宣判他的死刑时，苏格拉底对他的处境作

---

[4] 阿伦特作为一名犹太人的体验，包括她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创建以色列国的看法，受到很大误解。本丛书收集了她的未发表作品，其中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著述将是下一卷的主题。

出判断，决定留下来死在雅典，而不是逃走以在其他地方过无意义的生活。对阿伦特来说，正是他的典范而非任何论证，把他的上述命题确立为西方道德思想的奠基性原则。<sup>[5]</sup>苏格拉底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他身处的制度可能是腐败的，但在希特勒德国的意义上却绝非邪恶。然而，道德原则难道不是要超越各个历史时代和世界的偶然性吗？

《艾希曼》激起的其他种种不同反应同样令阿伦特感到困惑。例如，经常有人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艾希曼，意思是在每个人都只是机器“零件”的生活状况下，负责任的行为与不负责任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也随之瓦解了。对阿伦特来说，耶路撒冷审判的主要优点，像任何审判一样，就是它不把被告艾希曼这个最大的案牍凶手看作一个零件，而是看作就其生命来接受审判的个体，一个为谋杀数百万生命的特殊责任而接受审判的特定的人。他自己没有杀人，但他通过提供受害者，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往奥斯维辛的工厂，而使杀人的罪行得以可能。最终，法庭认定艾希曼比那些实际操作杀人机器的人罪更大——而阿伦特同意法庭的这种判决。

另一种说法虽然与艾希曼无关，但奇怪地与上述反应相似，这种说法（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提到）认为，在纳粹统治的恐怖中，被诱惑去行不义与被胁迫去行不义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不应期待任何人会像圣人那样行动。但是如果读了阿伦特的《艾希曼》，人们就会明白，不是她而是以色列的控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为何犹太人没有抵抗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协助了灭绝过程。对于阿伦特来说，诱惑观念的引入进一步表明道德的错位，因为道德在所有人类自由的观念面前消失了。道德基于选择上的自由，在后者那里诱惑和

---

[5] 在本书“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阿伦特清楚地表明，她不认为苏格拉底的生活是“政治性的”，尽管他的死实际上对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非常重要。当需要时，他就履行作为一名雅典公民的职责，作为一名战士去战斗，并且至少还做过一次雅典的政府官员。但他更愿意与自己和与朋友们思考，以与“大众”相互影响，在此意义上，被宣判死刑时，他的判断和行动是道德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胁迫绝不相同，正如阿伦特所说，诱惑不能构成对任何行为的“道德性的辩护”，而就道德问题来说，胁迫倒确实能提供些许辩护。

至少一度有人说，由于“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是“现代最重大的悲剧事件”，所以《艾希曼》是“过去十年来最精彩动人的艺术作品”。<sup>[6]</sup>阿伦特发现这种反应中的逻辑极其错误。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她并非从自己的思想中构造一出悲剧，而只是仔细观察了在一场特别的审判中展开的事实。对她来说，与这次审判惟一相关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判断（最终是她的而不是法庭的判断），它把艾希曼侵犯整个人类的复数性的罪责揭示清楚了，这种复数性，“（就是）人的多样性……没有它，‘人类’或‘人性’这些词将被剥夺意义”。换句话说，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洞悉了一种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意义，艾希曼的罪行才能够被公正地判决为针对人性、人的尊严和每一个人的罪行。

也有人，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提出了一种因其看似有理而颇难反驳的理论，这是对当今报纸上报道一些平常而琐碎的犯罪行为时滥用这个用语的一种反应。对阿伦特来说，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教条，而是表示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这样的人从不思索他在做什么，无论是作为掌控犹太人运输的盖世太保官员还是作为监狱里的一名囚犯。整个审判证实并肯定了这一点。恶的平庸性这一残酷的事实令她震惊，因为正如她所说，“它与我们关于恶的诸理论相矛盾”，它指向某种尽管“真”却一点儿也不合理的东西。在《艾希曼》中，阿伦特还没有清楚考虑，没有构思，甚至没有想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她说，它总是“逃避思考”。

除了一篇文章之外，收集在本书中的演讲、讲座和论文都发生在那次审判之后，它们以不同方式表现了阿伦特理解艾希曼之不能思考

---

[6]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1964年3月1日。

xv 的努力。从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和《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探究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艾希曼作为一个具体的、平常而普通的人,一个“小丑”,作为一个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徒而凸显出来。阿伦特震惊于下述事实:艾希曼的平庸性,其自发性的彻底缺失,既没有使他成为“怪物”,也没有使他成为“魔鬼”,而是使他成为最极端的恶行的帮手。这种感受是一种催化剂,促使阿伦特最终理解了本书的首要论题,即责任与判断问题。

《艾希曼》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它虽未被明确提出来,但实际上导致了这些以及其他未提及的误解?<sup>[7]</sup>如果确实有的话,我怀疑那就是艾希曼的良知这个着实令人困惑的问题了,除了阿伦特,没有人发现、理解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漠然至少在两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在作证时,艾希曼充分表明了他拥有通常叫做良心的那种东西。当他被以色列警方审讯时,艾希曼声称“他一直按照康德的道德概念生活”,他一直“遵照康德的义务规定”行动,他不是简单地服从希特勒德国的法律,而是使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统一起来。<sup>[8]</sup>第二(尽管这一点几乎一直被否认),非常清楚,在面对艾希曼的证据时,阿伦特所做的恰恰就是她声称要做的,即报告审判中出现的情况,尽管她的报告远比通常的这种报告复杂。艾希曼的“良知”在审判过程中显露出来,这对恶的平庸性之意义不可或缺——这是从后者(恶的平庸性)的概念中成形的前者(良知)的证据——但同样必须附带说明,在关于恶的理论研究史中,艾希曼的平庸性这个概念揭示出,

xvi

---

[7] 对于《艾希曼》出版之后引起的争论所涉及的文章和著作的全面论述,可参考R. L. 布拉汉姆的《艾希曼事件:文献资源》(纽约:匈牙利犹太人世界联合会,1969)(R. L. Braham, *The Eichmann Case, A Source Book*, New York: World Federation of Hungarian Jews, 1969)。自1969年以来,有关阿伦特的各种著作都讨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而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例如对其意义的共识),从而使《艾希曼》成为自出版以来最富争议的作品。

[8] 艾希曼的“原则”是希特勒的意志而非康德的实践理性。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心智正常的人们不愿意分析人的良知现象。相反，他们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动机、不可抗拒的感情或行动“命令”，或更微妙地，作为一个潜伏于无意识中的意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良知现象好像抵制对它的分析。

无论如何，阿伦特并没有试图形成一种恶的平庸性的理论，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阿伦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我有何种权力获得并使用这个概念？”在这里以及更详细地在构成《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座中，阿伦特关注于体现在“良知”及其希腊同源词中的经验，注意到发生在基督教的出现和意志的发现之中的良知功能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最后暗示良知现象可能出现在它极少被寻找的地方，即在运用判断能力的地方，阿伦特由此逐渐推进了她的理论研究。这几乎像是她在对“良知”这个词进行审判，用各种问题向它挑战，这些问题的鲜活根源虽已湮没于亘古时代，但在她心灵中一直茁壮生长。阿伦特在这场审判中表现得像一个激烈的提问者 and 公正的法官。这场审判始于耶路撒冷，但并没有在那里终结，而且至今仍未终结。各种平息《艾希曼》论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相比于这些努力，本书的这些研究（包括阿伦特身后出版的未竟之作《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当然有着更多紧要的问题。

更紧要的就是阿伦特的这种努力，即重新理解道德作为区分是非和善恶的知识的意义。正是尼采这位阿伦特在精神品质而非智力影响上——在一种相同的洞见能力而非系统化哲学的的能力上——更为亲近的思想家和语言学者认为，道德和伦理不过是它们所指代的那些东西：风俗和习惯。在她的祖国，阿伦特亲眼目睹了她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是自然的且看起来安全合理的道德秩序在纳粹统治之下崩溃了，最极端的例证就是把“你不可杀人”这一诫命颠倒为“你要杀人”；而在二战之后她又目睹了另一次颠倒，即原先的道德秩序重新被塑造起来。但是，它能有多少合理性，会有多可靠呢？尼采的这个观点，即人类行为的规范和标准所依赖的原则都是可变易的价值，不是最终



被证实了吗？无论有人多么希望阿伦特会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她并不同意。她相信，尼采“永恒的伟大”不在于他展现了道德之所是，而在于他“敢于表明道德已变得多么陈旧而无意义”，两者当然区别甚大。对那些源于神圣律法或自然规律（所有的个别情况都可以被包括在它们之中）的准则和价值，阿伦特像尼采一样拒绝接受，而与尼采不同的是，对于2500年之中“文学、哲学和宗教”没有为道德提供“另一个词”，或者为“关于用同一种声音与所有人交谈的‘良知’的存在”的道德说教”提出“另一个词”，阿伦特感到惊讶。最令她惊奇的是这个事实：一些人确实在辨别是非，以及更为重要的，在任何处境下，只要他们有能力，就会按照他们自己作出的区别来行动。尽管他们既非圣贤亦非英雄，既没有听到上帝之声，也没有通过普遍的自然之光 (*lumen naturale*) 看到，但他们知晓并遵循善恶的区分。在20世纪展现的世界里，这个事实对阿伦特来说具有如此重要的启示意义，她不会把它作为一种天生的“高贵”而忽略。

xviii

从1940年代开始，至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阿伦特著作的主旨是她所称的极权主义“极端的”或“绝对的”恶：纳粹主义出于某种人类不可理喻的动机对人类的大屠杀。极权主义蔑视并冒犯人类理性，通过摧毁人们据以理解政治、法律和道德的那些传统范畴，它还消除了人类经验的可理解性。尽管绝对史无前例，摧毁人类世界的可能性还是被极权主义集中营的“实验室”进行的试验展现出来了。在那里，独特的人类生存、人性理念的实质都被消除了；个体的生命被当作“多余的”东西，转化为推动灭绝机器运转的“无生命的”原料，而灭绝机器就加速着自然和历史的意识形态法则的运动。<sup>[9]</sup>尼采或他之前任何思

---

[9] 在纳粹德国，自然“法则”是要创造一个统治性种族，这当然合乎逻辑地要求灭绝所有被宣布为“不适于生存”的种族；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历史“法则”是要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当然也就合乎逻辑地要求消灭所有“腐朽的”阶级，即由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构成的阶级。本书很少提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道德问题在那里被伪善掩盖了。从道德上说，尽管不是从社会意义上说，纳粹主义是更具革命性的运动。